第39卷 第6期
2025年11月

湖 南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Vol. 39,No. 6
Nov. 2025

DOI:10.16339/j.cnki.hdxbskb.2025.06.011

先唐总集序文的书写模式与总集建构*

翟新明,刘阳

(湖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 要]先唐时期的总集序文,可以分为以《文选序》《玉台新咏序》《弘明集序》为代表的选本总集序文,和以《金谷诗序》《兰亭集序》为代表的活动总集序文;就书写模式而言,由写作前提、选录标准、总集信息三大构件组成。在写作前提中,选本总集序文通过梳理纵向发展史,引入总集编选的现场;活动总集序文则以记叙事件为主,更加强调活动现场。选录标准主要体现在选本总集序文之中,通过对具体文章的拒绝与接受,展现编选者的权力与文学观念。选本总集序文中的总集信息揭示出书名、卷帙、编排原则等书籍信息,呈现对总集编纂的附合;活动总集序文的总集信息则相对模糊,并可被置换为议论与抒情等文学文本,实现对书籍的"游离"与"超越"。三大构件对应于总集编纂的起因、过程、结果,共同完成物质与理论形态上的总集建构。

[关键词]先唐;总集序文;写作前提;选录标准;总集信息

[中图分类号]G256;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25)06-0090-08

The Writing Patterns and Structural Functions of Prefaces in Pre-Tang Anthologies

ZHAI Xinming,LIU Y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Abstract:The prefaces to anthologies compiled during the pre-Tang period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istinct categories: those to selected anthologies (e. g. ,*Preface to Wenxuan*,*Preface to Yutai Xinyong*,*Preface to Hongmingji*),and those to event-based anthologies (e. g. ,*Preface to Jingu Poems*,*Preface to Lantingji*). In terms of writting patterns,these prefaces comprise three components: writing premises,selection criteria,and anthology information. For selected anthologies,prefaces establish writing premises by trac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literary,thereby situating the anthology within its compilation context. In contrast,prefaces to event-based anthologies prioritize the narration of social gatherings,foregrounding the immediacy of the event itself. Selection criteria are primarily reflected in prefaces to selected anthologies,where the deliberat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of specific texts serves to assert the editors' editorial authority and literary ideals. Meanwhile,anthology information in such prefaces meticulously records titles,volume numbers,and editorial principles,demonstrating adherence to the anthology's material compilation. Conversely,anthology information in prefaces to event-based anthologies remain relatively vague and frequently give way to literary discourses such a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r lyrical expressions,thereby transcending the material confines of textual compilation to achieve discursive autonomy. Corresponding to the causation,process,and outcome of anthology compilation,these three components collectively realize the

* [收稿日期]2025-0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古总集观念演进与编纂互动研究(22CZW016)
[作者简介]翟新明(1989—),男,山东泰安人,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structural formation of anthologies in both material and theoretical dimensions.

Key words: pre-Tang period; anthologie prefaces; writing premise; selection criteria; anthology information

一般而言，成书当有序。书序是书籍诞生时伴生的重要文献，在发展初期已具备一定的写作范式。孔安国《尚书序》云："《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1]21 关切于作者。王应麟称："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2]3841 关切于编纂。吴讷引吕祖谦称："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3]166 已注意到序文类别的区分，前者主要涉及编纂，后者则以活动为主。张静概括序文的两种类型称："一是具有依附性的序文，内容多为述篇章之所作，言内容之次第。""二是具有独立性的序文，内容多为叙事件之缘起，抒情绪之所蕴。"[4] 亦是对吕祖谦意的延伸。概括而言，书序用以揭示作者观念、书籍编纂等相关信息，既可作为附庸于书籍的外在形态，在后期也可脱离书籍而独立存在。

随着书写材质由金石向竹帛再向纸张的变革，六朝编书之风盛行，文学观念的变化进一步促成了"总集"在编纂和理念上的生成。作为总集编纂过程中重要的"副文本"，总集序文能够展示作者撰集之本意，体现作者的编纂与总集观念，尤其是其中的文学批评观念，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更进一步，对于总集序文书写模式的考察也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总集编纂有其起因、过程和结果。根据编纂的起因不同，先唐时期的总集可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出于编选诗文目的而产生，可以称为"选本总集"。选本总集以晋代挚虞《文章流别集》为最早，其编选的目的在于"采擿孔翠，芟剪繁芜"[5]1236，故以"选"为基本特征。选本总集又可根据选录文体多寡而分为多体选本和单体选本，前者如孔逭编《文苑》、萧统编《文选》，后者如谢灵运编《赋集》、徐陵编《玉台新咏》等。第二类基于特定文学活动而产生，相对于一般性的选本总集，可以称为"活动总集"。活动总集以宴会等活动为契机，进行文学创作与唱和，又集中于诗歌唱和，如陈宣帝太建(569－582)初年，李爽、张正见、贺彻等人"游宴赋诗，勒成卷轴，伯阳为其集序，盛传于世"[6]527，即《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徐伯阳《文会诗》三卷。此外如《七录》著录魏、晋、宋《杂祖饯宴会诗集》二十一部，《隋书·经籍志》著录《齐释奠会诗》《齐宴会诗》《青溪诗》，《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晋元氏宴会游集》《元嘉宴会游山诗集》及颜延之《元嘉西池宴会诗集》等，均因游宴活动产生。

呼应于总集分类，先唐时期的总集序文也可分为选本总集序文与活动总集序文两类，但限于文献缺佚，见存的总集序文较少。目前完整存世的选本总集序文，有南朝梁萧统《文选序》、徐陵《玉台新咏序》与释僧祐《弘明集序》；现存的活动总集序文，则以西晋石崇《金谷诗序》与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为代表①。两种类型下各篇总集序文的写作时间相近，书写模式相通，呈现出时代背景下的趋同性。与总集编纂的起因、过程、结果相对应，总集序文写作呈现出写作前提、选录标准、总集信息等具有逻辑关联的三个基本构件②，但两类序文也因写作前提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写作形态。以下即从此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一　历史与现场：先唐总集序文的写作前提

总集编纂往往受到编选者或某一流派文学理念的影响，由此呈现其文学批评价值。樊宝英认为："'选本'或'选集'满足古人讲述文学史的渴望。由于每个选者在面对历代文学作品时都是以自己的眼光加以筛汰和选择，其过程必然融入选者不同的文学见解。"[7] 总集序文也就成为编选者文学观念的直接表现，正如叶晔所指出的："在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视域中，书序文首先是一篇文论作品，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有其重要的文体学意义。"[8] 在总集序文写作中，写作前提属于其前置部分，通过对文学发展的历史回溯，引入编纂背景的介绍，并从历史的梳理转向编选的当下。读者可借总集序文的写作前提，探

① 先唐时期，与释僧祐《弘明集序》相类似的，还有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序》，但《出三藏记集》属于佛教目录而非总集，故不纳入讨论；与石崇《金谷诗序》、王羲之《兰亭集序》相类似的，还有东晋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一年(434)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齐武帝永明九年(491)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等，但后者均未如石崇、王羲之一般提供明确的结集信息，故姑置不论。

② "构件"为徐雁平提出，受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一书中"module"一词影响，指称集序中"有相对固定的叙述程式"的"信息集中的文字单元"。见徐雁平《"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成为一种文学叙写方法——以明清集序为研究范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

究总集编选者的文学观念,窥探当时的编纂状态与其背后的社会风潮。

在先唐总集序文的两种类型中,选本总集序文在写作中更加偏向历史的纵向梳理。选本总集是对文章的选录,在序文的写作前提中,首先涉及对文学发展的认知和历史论述。如萧统《文选序》称: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 ……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尝试论之曰:……众制锋起,源流间出……作者之致,盖云备矣![9]1-2

自"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到"随时变改,难可详悉",《文选序》首先提出"文"的概念,并从文字创始演进到《易》之天文、人文,考察"文之时义"的历史演变。自"尝试论之"至"作者之致,盖云备矣",则由《诗》之六义入手,引入赋与楚辞,进展到文体分类,以"众制锋起,源流间出""作者之致,盖云备矣"作结,重点涉及文学与文体学观念。《文选序》中所提出的"文"的概念及对其的认识,向来引起学术界关注,如傅刚称:"关于文学观,萧统坚持进化论。……承认文学的发展进步,对后世文学表示了肯定。"[10]142-143 至于《文选序》中涉及的文体分类,与成书的《文选》实际分类有所不同,由此亦可推见《文选序》的写作与《文选》的编纂并非同时,故产生观念与实践上的区别。

《文选》属于多体诗文选本,故其序文需对文学和多种文体进行整体梳理。徐陵《玉台新咏》仅选录诗体,其序即侧重于诗体尤其是"新诗"的发展流变:

夫凌云概日,由余之所未窥;千门万户,张衡之所曾赋。周王璧台之上,汉帝金屋之中,玉树以珊瑚作枝,珠帘以玳瑁为押,其中有丽人焉。……真可谓倾国倾城,无对无双者也。加以天时开朗,逸思雕华,妙解文章,尤工诗赋。……其佳丽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11]1-2

《玉台新咏序》以骈文写成,其写作前提虽不如《文选序》层次明晰,但也可见对诗歌发展史的总结。《玉台新咏》所收作品,基本以女性为歌咏对象,或为女性创作,或为男性代言,故其序即以"丽人"为引,实际上讲述了与女性以及诗作相关的发展史,张蕾即认为其"体现了鲜明的诗史意识"[12]22。其中涉及大量诗歌本事与意象,并以"其佳丽也如彼"总结"倾国倾城,无对无双",以"妙解文章,尤工诗赋"引起"其才情也如此"。至于其间所用"琵琶新曲""箜篌杂引""新声""新制"[11]2 等语词,在梳理女性诗歌发展史之外,又为引出"艳歌"[11]3 的选录标准进行了理论铺垫。

《玉台新咏序》对女性的关注,还可用以考察六朝时期的女性及其创作、阅读等情况。南朝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女性别集,但均已失传,《玉台新咏》收录宫廷女官韩兰英、鲍照之妹鲍令晖、徐悱之妻刘令娴等不同身份女性作家的作品,可反映出南朝不同阶层女性文学创作的部分面貌。又如许云和认为《玉台新咏》是"当时所编的诸多后宫读物中的一种"[13]93,田晓菲也重点强调女性在文学上的主体地位:"在梁朝,很多贵族女性在当代文学生活中十分活跃,而且,《玉台新咏》也并不是这一时期第一部或者唯一一部以女性为读者对象的书。在中国早期中古时代,社会上层女性一般来说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14]204 女性(或为女性)的写作、结集传统,深刻影响了南朝整体的审美趋向与旨趣,构成《玉台新咏序》写作前提的背景,并在写作内容与整体写作风格上得以体现。

文学选本的序文写作侧重于纵向的文学史梳理,这一传统也对佛教文学选本的序文写作产生影响,后者又更多带有宗教色彩。释僧祐《弘明集序》称:

夫觉海无涯,慧镜圆照。化妙域中,实陶铸于尧、舜;理擅系表,乃埏埴乎周、孔矣。然道大信难,声高和寡;须弥峻而蓝风起,宝藏积而怨贼生。……自大法东流,岁几五百。缘各信否,运亦崇替;正见者敷赞,邪惑者谤讪。至于守文曲儒,则距为异教;巧言左道,则引为同法。距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乱;遂令诡论稍繁,讹辞孔炽。……此幽涂所以易坠,净境所以难陟者也。[15]1-3

此序先将儒家纳入佛教范畴,但"道大信难,声高和寡",也就必然导致"怨贼"的情况发生。佛法东传五百年间,在中国引起各不相同的反应,也导致不同的后果。《弘明集序》对佛教发展及其中国境遇进行了简单的历史梳理,也就自然引出弘教、翼教的编纂动机。

选本总集序文对文学、佛学等学术观念及其历史的梳理,自然会延伸到当下即编选的"现场",进而介绍其编选背景。《文选序》称:"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

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9]2 萧统说明自身具有编书的闲暇时间，有七代千年的文章可供选择，也具有“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主观动因，陈述了个人与时下编纂文学选本的原因。《玉台新咏序》称：“但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籍篇章，无由披览。”[11]3 徐陵根据当时诗歌散逸的情况，说明急需编纂以供阅览。《弘明集序》称：“祐以末学，志深弘护，静言浮俗，愤慨于心，遂以药疾微间、山栖余暇，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15]4《弘明集后序》亦称：“余所集《弘明》，为法御侮。”[15]794 释僧祐指出编纂《弘明集》的目的在于摒弃异端，弘扬佛学雅论。

在选本总集序文中，从历史的回溯到现场的介绍，是写作前提内部的自然延伸，由此凸显出“选”的主体特征。活动总集序文则一般创作于活动发生的当时，或在活动结束之后、总集编纂完成之前，对历史的梳理并非必要，写作前提也就重点落脚于当日活动的情景现场。石崇《金谷诗》编于西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其《金谷诗序》见录于《世说新语·品藻》刘孝标注：“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遂各赋诗，以叙中怀。”[16]628 可知此次宴集活动的目的在于送别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还返长安，石崇在金谷园宴请宾客，饮酒赋诗，诗成之后遂编集作序。王羲之《兰亭集序》则为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兰亭集会活动而作：“永和九年，岁在癸丑，莫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16]743 两篇序文均在行文起始介绍活动的时间、地点和背景，重在还原活动与编选现场。又据《世说新语·企羡》记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16]743 王羲之将《金谷诗序》作为匹敌对象，也可见活动总集序文的写作前提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共有范式。

在总集序文中，写作前提的存在是最为基础的，本质上是总集编纂和序文写作的内生动力。在内容上，写作前提作为总集序文的前置部分，包含了历史梳理和编选现场两个维度；在结构上，写作前提作为最重要的构件，塑造了总集序文的叙事策略基础，进而引出选录标准与总集信息，以其存在的必要性与稳定性搭建起整个总集序文的叙述与书写模式。写作前提横跨时间(历史)与空间(现场)，阐述总集编纂的多种不同境况，适用于不同场景下发生的总集序文撰写，也因此同时适应选本总集与活动总集两大类型序文的写作。

二　拒绝与接受：先唐总集序文的选录标准

总集编纂需要确定其编选范围，即梁启超所称：“总集之选，贵有范围，否则既失诸泛滥，又失诸罣漏。”[17]545 选录标准也成为总集序文区别于其他类型序文的本质特征，如王玥琳认为：“尽管在总集中，选家也可能对文学本体进行更为直接的阐述，如《文选序》开篇从文学的初生一直讲到后世各种文体的特征，可谓辨章文学，品藻源流，不过对于楚辞序、别集序、书序，甚至一般文章序而言，也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文论表述……选录标准最能代表总集序与众不同之处。”[18]112 选录标准亦即总集编选的原则，是在写作前提影响下最具有文学实践价值的部分，也对总集编纂产生深刻影响。

在先唐两类总集中，活动总集发生在饯别、宴会、唱和等现场，此种场合下所有的文学创作都会被收录，以至于其选录标准就是参与活动与创作，由此消泯了“选”的过程和意义，也就无须在序文中再赘言选录标准。换言之，在活动总集序文中，选录标准会被重叠进写作前提和总集信息之中，如《金谷诗序》简单提及“余与众贤”“凡三十人”[16]628；《世说新语·企羡》刘孝标注引《兰亭集序》也仅有文末“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16]743 的简单记载。故以下仅以选本总集序文为例，探讨其选录标准。

在选本总集序文中，写作前提与选录标准虽然分属两个构件，但二者并非独立，而是具有直接影响和联系。一方面，写作前提是总集编选的依据，单向影响着选录标准，其对于文学历史的追溯和文学现场的介绍，深刻影响到总集编选标准的确立，成为序文作者阐述选录标准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选录标准也是对写作前提的直观反映，是对写作前提中文学史观和时代理念的选本实践。具体来说，选本总集序文的选录标准，可以通过拒绝与接受两个层面来实现。

在前文所述写作前提中，《文选序》已涉及对基本文体的介绍和区分。在文体发展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目录学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对四部文献的区分，也已成为时人认同的基本观念。如西晋荀勖《晋

中经簿》将文献分为甲、乙、丙、丁,相当于后世经、子、史、集四部;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变换乙、丙次序,“秘阁以为永制”[9]654;梁元帝《金楼子·著书篇》于著录书籍时也分甲、乙、丙、丁[19]995-1031。至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称:“王司徒表送秘阁旧事八万卷,乃诏比校,部分为正御、副御、重杂三本。左民尚书周弘正、黄门郎彭僧朗、直省学士王珪、戴陵校经部,左仆射王褒、吏部尚书宗怀正、员外郎颜之推、直学士刘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纪、中书郎邓荩、金部郎中徐报校子部,右卫将军庾信、中书郎王固、晋安王文学宗善业、直省学士周确校集部也。”[20]686-687可见梁时官方已有经、史、子、集四部名称。受到此种对于四部文献区分观念的影响,萧统在编选《文选》时,即在《文选序》中重点强调其选录集部文章的基本原则: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9]2

萧统所指出的“姬公之籍,孔父之书”即经部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即子部之书,“记事之史,系年之书”即史部之书,“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则杂糅子史,这些均为《文选》所排斥。在经、史、子之外的“篇章”“篇什”即集部文章之作,则在选录范围之内。究其原因,正如刘咸炘所指出的,“文集者名主篇翰,专指词赋之流及告语之文而言,经说、史传、子家不与也”[21]28,也由此呈现出四部界限,确立集部(文学)的主体性。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史部之中“综缉辞采”“错比文华”的赞论、序述,因其“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学特征而得以入选,则展现出史部文献对集部的“侵袭”。对经、史、子的“拒绝”和对集部文章以及赞论、序述的“接受”,既是对《文选序》文学“随时变改”观念的回应与实践,也凸显出《文选》编选标准的“稳固”与特殊变动[22]。

相较于《文选》选录多体文章而凸显集部与其他部类的不同,徐陵《玉台新咏》只录诗歌,首先便在文体上实现了对诗歌以外其他文体的“拒绝”。此外,《玉台新咏》对诗歌的编选对象侧重于“艳歌”:“燃脂瞑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11]3刘跃进从入乐角度强调《玉台新咏》的“歌辞总集”属性:“永明体和宫体诗可以说是更加精致化了的‘新声艳曲’,是《玉台新咏》编选的中心所在。”[23]82胡大雷则从序文本身出发指出:“所谓‘艳歌’,或称‘艳曲’‘艳诗’,都指有关男女情爱生活的诗歌作品。”“专门收录描述女色及女性生活的‘艳歌’,是《玉台新咏》最主要的特征。”[24]87,92由此,“艳歌”也就与写作前提部分提到的“新曲”“新声”“新制”[11]2形成呼应。《玉台新咏序》复称:“曾无忝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泾渭之间,若斯而已。”[11]3是则宣告其所收录的“艳歌”,与此前以《诗经》为代表的风雅文学经典之间形成“泾渭”分明的对等关系,表现出对后者的“拒绝”,而“不攀风雅,不避俚俗,正是徐陵对这部总集的定位”[12]55,也表明编者对《玉台新咏》在《诗经》以外别开生面的主观认知。

《文选序》《玉台新咏序》的写作前提与选录标准占据了所在序文的大部分篇幅,选本序文写作的构件已然稳定。作为收录佛教相关文献的选本总集,同一时期释僧祐为《弘明集》所作序文也遵循这一基本写法,其选录标准同样置于写作前提之后:“其有刻意剪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采。又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三宝,亦皆编录。”[15]4在释僧祐看来,凡是能够辟除邪说、守卫佛门正统的文章,都可予以收录,甚至于不属于佛教徒的“前代胜士”所作、不属于佛教文献的“书记文述”等,也都可因其“有益三宝”而进入《弘明集》的选录范围,体现出佛教在文献上的主动扩充。在显性揭示的选录之外,其所隐含的则是对于邪说的排斥,即将已在写作前提部分所揭示的“以暗乱明,以小罔大”“有尘视听”[15]3之类非佛门正统之作予以剔除。显性的“接受”与隐性的“拒绝”,共同塑成《弘明集》的选录标准,适可互相补足。

选本总集的编纂,必然具有基本的选录标准,并由此呈现出编选者独特的文学理论。《文选序》对于经、史、子文献的排斥,突出了选录集部文章的选本的纯粹性;至于特例的史部之赞论、序述,也主要出于其“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学特点,可视为萧统对代表性优秀文学典正风格的基本认知,同时扩大了选本的选录范围。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强

调“艳歌”，展示出宫廷文人群体对此类作品的集体认同，此书的编选内容在风格、题材、体裁上均与序文风貌紧密贴合，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以艳歌、宫体诗为主的文学创作与阅读风气，呈现出隋前文学思潮的主流样态。释僧祐《弘明集序》强调“建言卫法”“有益三宝”，彰显出明确的护翼佛教的宗教特征，与其他文学选本对于文学风格“接受”与“拒绝”的双重原则并无二致。

选本总集的选录标准，着重展示出编选者对于总集的“绝对权力”。一方面，通过拒绝某些文献的入选，确立了总集的边界，实现总集的相对纯洁性；另一方面，通过对符合相同标准文章的“破格”接纳，扩展了总集的外延，实现共同文学理念的塑成和传播。此种权力，在总集序文中即通过选录标准得以直接呈现，并指导选本总集在编纂过程中对文章的具体选录，成为选本总集序文最为核心的构成和本质特征。

三　附合与游离：先唐总集序文的总集信息

写作前提与选录标准属于总集编纂理念的先行内容，反映总集编纂的起因与过程，总集信息则与总集成书这一结果直接相关。在总集序文中，对书名、卷帙、编排顺序等信息的明确揭示都属于总集信息的范畴，但在不同序文中，这些信息未必全备。萧统《文选序》之末称：“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9]2 从书名而言，“文选”揭示了其文章选本的本质特征。从卷帙而言，“三十卷”确立了作为总集的容量与体量，其内容又包含了自周代至梁代之间的文章。从编排顺序即“次文之体”而言，可知其标准为以文体为一级分类、主题为二级分类（诗、赋二体之下）、时代为三级分类。《文选序》中所揭示的三种总集信息，与作为总集实物的《文选》相同；《文选序》所确立的分类编排标准，也进一步影响了后世同类总集的编纂体例。

《玉台新咏序》则仅涉及“凡为十卷”[11]3 的卷帙信息，而未涉及对“玉台新咏”书名的界定和解释，也未介绍各卷的编排原则。《弘明集序》先称“类聚区分，列为十四卷”，涉及卷帙和以类相从的编排原则；次称“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是对其“弘明”集名所作理论上的阐释；再称“兼率浅怀，附论于末”，与“类聚区分”相呼应，指出本书编排系以类区分，并附己见。[15]4《弘明集》选录文章多为论体，故非如《文选》一般按照文体顺序编排，而如罗宁所指出的，“《弘明集》是一部弘教护法文章的选集，其分类的体式并不明显，之所以说‘类聚区分’，是因为该书按主题将一些论辨文献集中在一起，如神灭论、夷夏论、沙门不敬王者论等，包括将某些书信答问聚合一处，都可说是‘类聚’”[25]63－64，整体呈现出主题分类的特征。

以上是选本总集序文对总集信息的显性揭示，以及其与总集编纂结果的对应。在书名、卷帙、编排顺序等基本信息之外，序文作者也是从属于总集序文的隐性信息，对总集编选者也具有“确认”作用。一般而言，出于对自序的理解和界定，总集序文作者往往被认为即是总集编选者，但这一“常识”又不断受到挑战。《文选》的编选者是否即是《文选序》的作者萧统，抑或别有他人参与，已成为《文选》研究界尚未定论的公案[10]121－122。《玉台新咏》的编选者身份，也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争议话题。通过对《玉台新咏序》的解读，章培恒认为“此书实是一位女性所编，而且出于陈后主妃子张丽华之手的可能性很大”[26]，胡大雷则认为“《玉台新咏》当为梁元帝徐妃所‘撰录’”[27]。尽管章培恒、胡大雷等学者的考证同样遭到了质疑，但其通过总集序文内容来考察编选者身份的尝试，也显现出总集序文作者与编选者未必对等的可能性，并可借以重新考察总集可能存在的真实编录者，亦可见总集序文伴生于总集的“副文本”作用。

选本总集序文中的总集信息对于以物质形态存在的书籍也具有一定的还原与考据作用。《文选序》所称“都为三十卷”，自是《文选》本来面目；至唐代李善注本、公孙罗注本均析为六十卷，已非旧貌；吕延祚等上五臣注本，又复为三十卷，力图恢复《文选》原貌，可见序文的总集信息对于总集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恢复旧貌的重要性。《玉台新咏》的情况较为复杂。除敦煌唐人抄本残卷（P. 2503）外，《玉台新咏》还存在宋代陈玉父刻本、明代郑玄抚刻本两个系统，所存均为十卷，与《玉台新咏序》记载一致，但在各卷编次、所收作者和诗歌数量上则存有较大差异[23]75，与敦煌本的编辑体例也有不同[28]。一方面，因《玉台新咏序》中仅提及“十卷”这一简单的卷帙信息而未涉及编排原则，故《玉台新咏》虽存有两个十卷本的版本系统，但面貌却大有不同，可见总集序文中缺失的信息在客观上限制了对书籍物质形态的还原。

另一方面,《玉台新咏》明郑玄抚刻本对宋刻本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作者和篇目增补,“实际上是对原作的一种接受方式。补编者是以自己的眼光和思路来把握原书的内容及总体格调进而补选的”[12]150。在总集本身未能保存原貌的前提下,后世抄刻者可以通过阅读总集序文的写作前提和编选原则,获取相关信息,进行新的编选,从而弥补总集信息的不足,指引书籍物质形态的变动。

活动总集序文一般只简单言及编排顺序与书籍体例,而并不涉及明确的书名、卷帙等信息。如石崇《金谷诗序》称:“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16]628 可知此集的编排体例,先列作者的官职、姓名、年龄等信息,次附诗作。因作为总集的《金谷诗》已亡佚,除前引序文明确提及的苏绍之外,《世说新语·容止》刘孝标注还引石崇《金谷诗叙》:“王诩字季胤,琅邪人。”[16]721 可见被送别的王诩也曾作诗并被收入《金谷诗》中。今见存完整的作品仅有《文选》收录的潘岳《金谷集作诗》一首,此外尚存潘岳《金谷会诗》、杜育《金谷诗》四言残句。从编排顺序而言,《金谷诗序》将时年五十的苏绍列为第一,《世说新语·品藻》也记载:“谢公云:‘金谷中苏绍最胜。’”[16]628 而苏绍之官职并不出众,则《金谷诗》所录诸人或当以年齿为序[29]。潘岳(247—300)此时亦年五十,石崇(249—300)又少潘岳两岁,其排序也应考虑到同岁不同月的情况。而作为总集的《金谷诗》未被相关文献和书目著录,也就无从考知其卷帙情况。

与《金谷诗序》相同,《兰亭集序》也有“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16]743 之类对参与者的记载。唐、宋时期又相继有文献记载、考证参与此次集会的人员,至桑世昌《兰亭考》卷一完整收录了赋诗者、不能赋诗者之官职、姓名等[30]148-149,相当于将已经亡失的《兰亭集》进行了重辑。但《兰亭集》原本“列序时人”的编排原则已无从推知,以《兰亭集序》对《金谷诗序》的匹敌而言,或也以年齿为序。此外,《兰亭集序》以孙统居首,今存宋人记载则以王羲之居首,其次为谢安、谢万、孙绰、徐丰之,孙统位居第六[30]148,也可见后世辑佚者在总集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对总集编纂所进行的“修正”。

总集信息是对总集编纂完成形态的回顾性记录,其信息保存虽有多寡,但都与总集编纂之间形成理念和实践上的附合。值得注意的是,活动总集序文的选录标准已然隐藏,如果总集信息这一构件再被删除乃至替换,则其与物质形态的书籍的联系也将大大减弱,甚至达成序文“游离”乃至“超越”于书籍之外的新形态。《兰亭集序》即存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形态,为进一步讨论活动总集序文中总集信息构件和书写模式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

《兰亭集序》之名首见于刘义庆《世说新语·企羡》,全文见录于《晋书·王羲之传》,《世说新语·企羡》刘孝标注则引作《临河叙》,二者属于同篇异名,但在文本上存有详略和不同。前文所述具有总集信息的《兰亭集序》实际上引自《临河叙》,作为总集序文,其与《金谷诗序》在篇幅、内容、书写模式上均相类似。《晋书·王羲之传》中收录的《兰亭集序》则主要呈现为文学文本,《临河叙》中“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16]743 以下的总集信息被删去,又增补入“夫人之相与”以下大段抒情、议论文字,由此造成序文完全缺失了总集信息。读者所普遍接受的是具有文学和哲学属性的《兰亭集序》,其最终展现的文本面貌与总集的书籍形态已无关联。正因总集信息这一构件被取代,《兰亭集序》才最终跳出活动总集序文的书写模式,也就游离于作为书籍的总集之外,演变为独立的序文,成为兼具文学、哲学色彩的传世名篇。

可以说,作为活动总集序文的《临河叙》,既具有总集序文的基本构件,又具有游离于书籍以外的动态可能。从《临河叙》到《兰亭集序》,可以清晰展示出作为总集序文基本构件的总集信息被剥离并被改写为文学文本的过程。由于总集信息构件的剥离及与总集编纂无关的文学文本的加入,《兰亭集序》也就完成了从“游离”书籍到“超越”书籍的写作模式转变。《兰亭集序》之所以能够被长久保存并成为名篇,正是因为其在写作过程中,未被传统总集序文书写模式束缚,而是以个人哲思与人生感慨取代总集信息,其最终呈现的美学意趣、哲学深度也就超越了总集序文作为书籍附庸的“副文本”作用。

四 结 语

先唐是集部兴起的时代,楚辞、别集、总集共同构成了集部之学。相较于单录楚辞一体的楚辞和单收一人作品的别集,总集选录的对象更为繁复,或兼收众多文体,或兼录众人之作,能够更为充分地展现文学发展史,经由总集序文书写所呈现的文学观念、

文学史表达、编纂理念等也就更加值得关注。作为总集的“副文本”，不同类型总集序文的书写模式既有相同，也有异化。而“副文本”本身便蕴含了“附属”与“超越”的双重含义[31]。从先唐选本总集到活动总集，正可从其基本构件出发，深入发掘总集序文与实物总集之间的“附属”与“超越”态势。

总集序文的写作前提、选录标准、总集信息三大构件，分别对应于总集编纂的起因、过程、结果，“写作前提”引其端，“选录标准”彰其旨，“总集信息”束其结，共同完成对总集物质形态与理论形态的建构。以《文选序》《玉台新咏序》《弘明集序》为代表的选本总集序文，同时具有三个基本构件，序文内容与总集的文本、物质形态紧密相连，形成强烈的附合关联，读者可由序文还原总集编纂的相关境况，深刻展现序文作为书籍“副文本”的“附属”功用。以《金谷诗序》《兰亭集序》为代表性的活动总集序文，基本只存有写作前提，也会提及少量总集信息，与总集编纂相对游离。因应于活动总集的活动与事件属性，序文的总集信息构件可被替换为抒情、议论性的文学文本，活动总集序文的写作程式减弱，与物质形态书籍的联系也有所减弱，并以崇高的审美意趣与广阔的思想深度实现了“超越”书籍的转变，走向更为充实的写作样态，同时对唐代活动总集序文的写作模式演进产生持续影响。

［参　考　文　献］

［1］　尚书正义［M］. 孔安国，传. 孔颖达，正义. 黄怀信，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　王应麟. 玉海［M］. 合璧本. 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

［3］　吴讷. 文章辨体序题疏证［M］. 凌郁之，疏证.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4］　张静. 序文之体与古今嬗变［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72－77.

［5］　魏征，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9.

［6］　姚思廉. 陈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23.

［7］　樊宝英. 选本批评与古人的文学史观念［J］. 文学评论，2005(2)：46－51.

［8］　叶晔. 副文本的秩序：《钤山堂集序》的写作策略［J］. 文艺理论研究，2024(5)：137－150.

［9］　萧统. 文选［M］. 李善，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　傅刚.《昭明文选》研究［M］. 修订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11］　徐陵. 玉台新咏笺注［M］. 典藏本. 吴兆宜，注. 程琰，删补. 穆克宏，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7.

［12］　张蕾.《玉台新咏》论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3］　许云和. 汉魏六朝文学考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4］　田晓菲. 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

［15］　僧祐. 弘明集校笺［M］. 李小荣，校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6］　刘义庆. 世说新语笺疏［M］. 刘孝标，注. 余嘉锡，笺疏. 北京：中华书局，2007.

［17］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第十七集：诗文［M］. 汤志钧，汤仁泽，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18］　王玥琳. 序文研究［D］.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8.

［19］　萧绎. 金楼子校笺［M］. 许逸民，校笺. 北京：中华书局，2011.

［20］　李百药. 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24.

［21］　刘咸炘. 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M］. 黄曙辉，编校.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2］　翟新明. 篇、体与文章选本：以《〈文选〉序》为中心的先唐总集编纂考察［J］. 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18(2)：84－89.

［23］　刘跃进. 中古文学文献学［M］. 增订版. 南京：凤凰出版社，2023.

［24］　胡大雷.《玉台新咏》编纂研究［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25］　罗宁. 中古文献的抄撰与抄合：兼论合本、子注［C］//查屏球. 抄本、印本与小集、大集：抄印转换与文学演变工作坊论集.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48－77.

［26］　章培恒.《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J］. 文学评论，2004(2)：5－17.

［27］　胡大雷.《玉台新咏》为梁元帝徐妃所“撰录”考［J］. 文学评论，2005(2)：52－56.

［28］　刘明. 敦煌唐写本《玉台新咏》考论［J］. 文学遗产，2010(5)：26－35.

［29］　张金耀. 金谷游宴人物考［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128－132.

［30］　孙明君.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31］　王润英. 反思与重构：从中国古代序跋看“副文本”理论的更新［J］. 励耘学刊，2024(1)：219－233＋319.